

【哲学研究】

“服务型 STS”理论及其论争

王彦雨

(中国科学院 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北京 100190)

摘 要:长期以来,建构主义 STS 与科技政策研究传统之间形成了相互分离、相互不信任的局面。而韦伯斯特则提出了“服务型 STS”理念,强调 STS 研究者应树立“决策服务”,进入“政策之屋”,力图打破 STS 与科技政策研究之间的栅栏。“服务型 STS”理论引起了学界的广泛论争,温、诺沃特尼与韦伯斯特就政策之屋内 STS 所应扮演的角色、服务型 STS 与学术型 STS 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展开了一系列对话与博弈。针对论争,从“STS 是否有必要进入政策之屋”、“STS 的服务对象是谁”、“STS 应采取何种策略与决策者对话”三个方面进行分析,提出未来 STS 应进入社会实践场这一观念。

关键词:服务型 STS ;学术型 STS ;政策之屋 ;参与 ;决策服务

中图分类号 :N0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2494(2013)04-0019-06

一、建构主义 STS 与科技政策研究传统间“对话之栅”的形成

STS 虽然源于对科技与社会关系的探讨,从更广泛的视角看,科学学(普赖斯的科学计量学传统)、默顿科学社会学属于 STS 研究领域,或是说它们是 STS 研究的理论源泉。但是,20 世纪 60、70 年代以后,STS 将主要的智力资源转向对科学知识、技术知识的具体内容进行社会学考察(即社会建构论,如 SSK、SST),导向对科学与技术知识的批判性反思,这使得 STS 逐渐远离对科技与社会关系的分析,其过于理论化的倾向也逐渐远离政策领域,从而将 STS 改造为一个以认识论分析、理论解释为主导的学术流派。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脱胎于科学学研究传统的科技政策研究日渐成熟,并成为具有自身独特研究范式、研究工具及研究策略的学术传统,出现了一批新的科学、技术(或工程)和公共政策(STPP 或 SEPP)方面的机构和学术成果。然而,在发展过程中,建构主义 STS 与科技政策研究传统之间出现相互分离甚至不信任局面,如《STS 指南》第一版《科学技术与社会——一种跨学科视野》(1977)便是由科学学研究专家 D·S·普赖斯等主编,是由科学学、科学政策研究推动和演变而来^[1]。而第二、三版《STS 指南》则转变为由 SSK 研究者如 S·贾撒诺夫、T·平奇等主编,其主导性研究成果也逐步变为 SSK、SCOT。另外,STS 长期出现高教会派(SSK、SCOT 等)与低教会派(如科技政策研究、STS 教育)之间的相互分离及对立的情况,两者之间的交流与沟通甚少,甚至在同一个大的会场中,两种学派的研究人员也很少到对方的场所宣讲自己的观点。建构主义 STS 既较少分析作为政策对象的科学活动,同时对于科技政策研究者与决策者结盟、为决策者服务的做法也并不支持。

建构主义 STS 与科技政策研究传统之间的敌意源于多种原因。(1)两者的科学观不同。建构主义 STS 大多强调科学知识和技术知识的社会建构性质,反对传统关于科学等同于逻辑和证据的“真理科学观”,而科技政策研究传统则大多沿袭了传统的科学观,强调科学知识的客观性及中立性,认为科学知识相对于其他知识类型(如文学、艺术等)具有其认识论优势。在建构主义 STS 看来,科技政策研究者在认识论上非常保守,采取了一种

收稿日期:2013-05-29

作者简介:王彦雨(1982-),男,山东巨野人,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为科技哲学与科技政策。

传统的科学主义观——将科学的认知争议搁置,从而与传统的理性主义科学观保持一致。(2)两者的研究目的不同。建构主义 STS 的主要任务是对科学知识和技术知识进行社会学解构,STS 也正是通过其认识论批判、依靠其建构主义的旨趣获得了其独特性及旺盛的学术生命力,它主要面向学术同行,而科技政策研究者则主要是面向决策者,为决策者提供与科技相关的咨询性信息。两者研究目的的不同,使得建构主义 STS 对科技政策研究者与决策者结盟,并从而形成“精英统治式的社会权力结构体系”的做法颇感微辞,因为建构主义 STS 一直坚持“对称主义”原则,对弱势群体保持一种天然的好感。(3)两者的研究原则具有很大的不同。将自己的角色定义为“客观的分析者”,即建构主义 STS 研究者试图在研究中保持一种外在的、中立的身份,并不试图在研究中扮演一种具有特定价值倾向的介入者或影响者,他要获得的是客观的、价值无涉的“事实”,在这一方面,STS 研究者延用了孔德以来对社会现象的科学式研究方法,即如科学家一样在研究中尽量避免非认知因素(如感情等)的干预,从而保持研究结果的实在性,而科技政策研究传统则注重研究的价值导向性,强调自身的研究为特定的人群服务。

二、“服务型 STS”理论——两大研究传统之间的创造性合解

2007 年,韦伯斯特(Andrew Webster)发表了《跨越边界:政策之屋内的社会科学》一文,试图弥合建构主义 STS 与科技政策研究传统之间的误解与对立,对建构主义 STS 所应扮演的新社会角色问题进行了重新解读。

韦伯斯特认为,典型的 STS 研究应该是对科学政策直接参与为特征的“服务型 STS”,在他看来,传统的 STS 研究通常为自己的研究领域设置栅栏,将自己的研究限于单纯的认识领域。而韦伯斯特认为应该使 STS 的研究延伸至政策领域,在“科学”与“政策”领域之间不存在认识论及文化层面的明显的区分特征,他主张对科学政策领域的直接参与,鼓励 STS 成为一种植根于实践的“服务型 STS”——STS 研究者应更多地采取中观或易于处理的方式,使 STS 研究者在政策之屋内发挥实际的作用。韦伯斯特的“服务型 STS”观点,力图打破传统 STS 在“知识研究”与“政策分析”之间所设的栅栏,实现 STS 与政策学、管理学之间的合作与沟通,强调 STS 应该植根于现实,为现实的科技决策服务,将“服务能力和品质(而非单纯的认识分析)”视为是当代 STS 研究的新特征。

韦伯斯特的“服务型 STS”具有如下特征:(1)在研究对象层面:“服务型 STS”将研究对象视为是“政策对象”。所谓“政策对象”,是指不再将研究对象仅仅限于“知识论领域中的科学和技术”,或是说单纯考察科学知识和技术知识的社会形塑过程,而是将视域扩大,研究处于社会与境、决策与境中的科学知识、技术知识,如政策变革中的科研机构、科研效率的提升、对未来科学技术发展的预测等,同时,结合政策学、管理学相关的概念、方法,对科学技术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知识生产效率与科研机构的组织等进行解读。(2)在研究策略层面:“服务型 STS”首先将关注议题置于当下,重点研究当前决策者所关注的一些现实科技议题,其次,“服务型 STS”更为注重自己的“介入者”身份,即强调通过 STS 研究者所提供的建议或是对现实事务的直接参与,影响当前科技政策的制订或实施,“服务型 STS”强调研究的现实行动力,力图使 STS 成为一种具有“行动力”的研究纲领。(3)从角色定位层面看:“服务型 STS”更强调一种服务品质,即不再排斥自己作为“政策咨询者”的身份,也不再忌讳在研究过程中表明自己的价值倾向,更多地希望通过自己的研究或建议为决策者、公众等提供问题解决方案。(4)“服务型 STS”不再单纯强调“解构”性(虽然其并不否认这一点),而是更为注重为人们提供建设性的意见,注重对科学和技术的社会影响进行解读并告诉人们“这些影响意味着什么”,“不仅仅是解构(科学),而是利用对科学的理解来形塑科学及科学政策”^[2]。

“服务型 STS”力图使 STS 研究者、科学研究人员及决策者整合在一起,打破传统存在于他们之间的各种界限,形成一个跨越 STS 与非 STS(non-STS)的信息互动与沟通网络(STS/non-STS nexus)^{[2]472}。“服务型 STS”力图以 STS 特有的研究视角(如伦理视角、文化视角、女性主义视角等)及方法为公众、决策者服务,通过这种参与式研究进路,使 STS 研究获得其认识论贡献以外的特有收益——参与社会发展进程、影响社会发展进程,并获得社会的认同。

韦伯斯特根据自己的经验,列举了 STS 研究参与“政策之屋”(policy room)、影响现实科技决策的三种场域:(1)对即将出现的技科学领域的描述及预期:即对特定的科技政策所可能引发的科研组织机构模式的转变及知识生产效率进行评估,并对未来更高效科研组织模式的特征、形成、结构、功能等进行预见性解读;(2)对未来的

技科学的开发:为科技决策提供更为高效的管理工具及模型,特别是为未来科学技术的发展及预见提供更高效的分析方法。(3)技科学应用的情景:运用 STS 相关理论模型,对当前特定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评估,特别是基于 STS 的“对称性”等原则进行分析,并提出改进性意见。

三、学界关于“服务型 STS”理论的论争

在韦伯斯特于 2007 年提出“服务型 STS”理论后,学界对这一观点进行了各种评判,诺沃特尼(Helga Nowotny, 2007)、温(Brian Wynne, 2007)先后发表了《存在多少政策之屋:基于经验的及其它形式的科学政策》及《被影响的幻觉晃了眼》等文章,从当前政策范式的转换、政策之屋内 STS 的角色扮演等视角,对韦伯斯特的“服务型 STS”理论进行评论与指摘。

1. 争论一:“服务型 STS”理论的参与效果如何

诺沃特尼非常支持韦伯斯特关于 STS 应该进入政策之屋、参与到政策制定过程中去的观点,“我全力支持韦伯斯特积极推动 STS 参与政策制定过程之中的观点”^[3]。但是诺沃特尼则对 STS 能否有效地参与到决策过程中去、能否获得决策者的认同持怀疑态度。诺沃特尼认为,韦伯斯特等 STS 研究者在试图介入政策之屋时,仍然是基于传统的知识批判路线,这种做法将难以获得决策者的认同。诺沃特尼认为,STS 研究者擅长对政策过程所依赖的文化基础进行批评反思,喜欢反思事情背后所隐藏的故事,“展示前台(front stage)陈述是如何依赖于许多不可见的后台(back stage)工作”^[3],这种批评路线会使得 STS 研究者在政策参与过程中陷入困境,因为它难以以为现有的决策提供足够的支持性信息。如果 STS 研究者仍然坚持其传统的对政策基础进行认识论破坏,不愿意承担对政策过程建设性意见的供给者角色,那么他便难以获得决策者的认同,而是被决策者群体视为是一个讨厌的捣乱者。

2. 争论二:“服务型 STS”理论能否适应当前新的需求

诺沃特尼认为,当下的政策行为范式已经发生了变化,原有环境中有效的参与模式并不一定能够在新的环境下适用。在诺沃特尼看来,当下的政策范式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如:(1)强调基于证据(而非经验)的决策模式:基于证据的决策模式强调一种可度量的决策分析方法,即能够对过去的政策经验、效果进行汇编、分析,通过一种可视化的方法来明确展示政策效果,或者是说基于某种标准来计算及展示资源的投入、使用过程、政策实施结果等,它强调“已经发生了什么,使用了何种资源,对象是谁,结果是什么……主要是能够被计算,因此也是可以被测量及管理的事情……这是一种‘标准化’实践”^[4]。(2)对数字化信息的追求:诺沃特尼认为,对数字的信任已经成为新的政策模式,力图通过数据、图表、指标等来展示投入与产出、收入与支出关系,“这种模式意味着测量的高效性”^[4]。如 2006 年美国科学基金委等开始倡导科学政策学(SOSP)计划,“其主要目的是达到这样一种要求:国家的公共及私人部门能够可靠地评估及计算他们过去在科学及工程活动中的 R&D 投入能够收到何种回报,并且去预测未来投资过程中决策失误的可承受的空间,以及可能的收益”^[4]。诺沃特尼认为,新的政策范式与韦伯斯特的“服务型 STS”理论显得并不相符合,因为 STS 仍然限于一种定性的分析与描述,主要是对当前的一些政策进行评价,然而这种定性的、或是具有较强批判性品质的分析模式,与当前决策者强调量化的数据支持及证据供给的做法是相悖离的,它难以以为决策者提供明确的证据支持或数据分析。

3. 争论三:“服务决策者”是否应成为评判 STS 工作质量高低的的标准

温认为,评估 STS 研究工作的质量,不应该以对政策活动的服务作为唯一标准。在温看来,韦伯斯特在服务型 STS 理论的释阐过程中,试图回避 STS 研究者的批判责任,而试图将自己的角色塑造为一种决策者的咨询人员身份,将 STS 研究者工作的评估标准定位于“能否产生实际的影响力”、“STS 研究者的建议是否有用”,“韦伯斯特建议 STS 与实际的政策情景、行动者及议题保持更为彻底的一致,从而使 STS 变得更为有用,也因此成为政策世界中的一个正常的行动者”^[5],使 STS 成为一种“基于行动的 STS”(action-oriented STS)。温反对 STS 研究者用“实用主义”观点来指导自己的行动,认为“独立的 STS 批评……应是这一领域中的首要优先问题”^[5]。而是否应该服务于决策者、是否应该关注现实社会实践并不能够成为衡量 STS 工作质量的标准,“对科学及政策世界的实际影响,并不是而且也永不会是评估好的或有意义学术——‘政策型 STS’工作的标准,一项工作没有被应用并不意味着它不是有用的”^[5]。在这里,温将“有用性”和“有意义”之间作了区分,认为有用的、或是说被应用

到实践过程中去的工作并非便是有意义的,有意义的工作也并非一定会被决策者所认同。在温看来,STS 研究者在讨论政策议题时,依然应该采取一种 SSK 式的批判态度,过度实用主义化的 STS 理念并非对 STS 自身的发展有益,也不一定能够为决策的民主化做出贡献。

4. 争论四:政策之屋内 STS 的研究对象是什么

政策之屋内 STS 的研究对象是什么 在韦伯斯特看来,STS 应该将自己的视角限于特定的政策建议,通过对特定政策的评估或是向人们提供具体的政策建议来实现 STS 的价值。而温及诺沃特尼则提出了不同的意见。无论是温,还是诺沃特尼,均反对将研究对象限于特定的、单个的“决策事件”的做法,在他们看来,任何特定的决策都并非是单个的独立事件,相反,任何决策活动都是存在于特定的社会及文化背景之中,与广泛的政治权力结构体系、各社会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紧密相关,同时,任何决策事件其背后总是隐藏着具有特定价值倾向的决策文化。STS 研究者不应仅仅关注“自己在政策之屋内能够为决策者做些什么”这一问题,如果将 STS 的功能限定在为决策者提供具体的建议,这将会使 STS 成为科技政策研究传统的一个附庸。如温认为,当前 STS 所面临的重要议题并非是明确的“决策议题”,或是说如何推动决策过程并产生实际影响力这一议题,而是应该将自己的角色定位于反对当前政策制度的文化基础,应该关注“政策综合症”,即政策制定过程中所涉及的各种因素(包括隐含的认识论、政策制定模式的文化基础),以及这些因素如何成为一种惯例性常规。诺沃特尼也表达了相似的观点,对韦伯斯特将自己的研究视野放之于某一个特定的政策之屋内的做法提出了批评,认为政策之屋并非只有一个,而是存在一系列政策得以共同建构的多个地点及网络,应将分析范围从单个的政策之屋扩延至不同政策之屋间的关系形成及意义阐释过程,或是说将政策之屋置于更广泛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中,不仅探析政策之屋内各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同时还应将政策之屋外的文化、社会制度、更广泛的利益相关者等纳入进来。

四、如何看待“服务型 STS”理论

“服务型 STS”理论的提出实际上是要解决这样的一些问题:建构主义 STS 能否实现与科技政策研究传统的融合,并在当代科技决策过程中发挥其独有的作用,从而获得自己在实践场域中的“行动力”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服务型 STS”理论,STS 是否有必要进入“政策之屋”?STS 的服务对象是谁,仅仅是限于决策者吗?STS 应该采取何种策略与决策者对话?

1. STS 是否有必要进入政策之屋

要回答这一问题的回答,我们先回顾一下 20 世纪 90 年代在 STS 学界所兴起的一场批判运动。20 世纪 90 年代初,一部分 STS 学者开始对传统 STS 过于强调学术分析、忽视自身社会责任做法进行各种批判,如温纳(London Winner,1993)指出,社会建构论“具有其视角的狭隘性”,它“缺乏,或是明显地不屑参与到那些类似于评估,或是能够帮助人们判断现有技术的道德和政治标准的研究当中去的动力”^[6];马丁(Brian Martin,1993)也表达了类似观点,马丁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STS 开始远离其社会基础及社会现实,走向了单纯的学术之栅中,“关于科学实践的理论变得更为复杂,对于科学家和行动者来讲,它越来越难以接近”^[7]。这些声音实际上是对 STS 过于囿于学术研究、与社会实践进行隔离做法的批判,STS 之所以要进入政策之屋,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理论:

第一,从传统 STS 的研究特征来讲:传统的 STS(如 SSK、SCOT)缺乏价值导向功能,它仅仅关注于对科学知识、技术知识生产过程的描述,或是如柯林斯所言,这是一种“后知后觉”^[8]式的回溯式研究,难为人们的未来判断和行动提供可靠的指导,“绝大多数 SSK 研究者并没有涉及‘基于这些洞见,我们应该做些什么’这一问题”^[9]。

第二,科学与社会之间形成了新的互动空间——后常规科学,在后常规科学中,“我们面临的是诸如转基因食品和 SARS 事件这样的新挑战……鉴于科学技术对社会的巨大影响,后常规科学让我们感受到了一种急迫,一种要求科学技术更具可说明性的急迫。这种急迫,在 STS 中表现为一种要求研究如何积极介入公共领域的科学争论的呼声”^[10],这为 STS 研究者分析、介入与科技政策相关的科学事件提供了新的社会需求。

第三,STS 的传统研究对象——科学知识、技术知识——的性质与内涵逐渐发生了转变,即科学与社会之间逐渐形成一种“共生产”关系,人们在很多情况下已经难以清晰地对以下环节进行明确的划界:如关于科学的内部学术评估与外部的社会评估,科学进步的学术影响与社会影响,科学共同体的学术决策与政府的政治决策

等。在这种情况下,对于 STS 研究者来讲,无论是科学知识和技术知识的性质,还是科学共同体与外部政治结构体系之间的关系,均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要求 STS 在新的社会语境下重新审视传统的研究进路及研究模式。这些问题迫使 STS 研究界不断反思原有的研究传统及研究策略,更多地关注现实社会问题,特别是将与科技政策相关的一些科技议题纳入到自己的研究范围之内,同时应积极地参与到相关科技决策过程中去。在这种情况下,“政策转向”成为当前 STS 界的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发展趋势。

2. “服务型 STS”的服务对象是谁

这是当前“服务型 STS”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对于这一问题,无论是韦伯斯还是温、诺沃特尼,均将答案视为是当前的“决策者”,或是说当前社会管理体系中的权威群体。

而实际上,“服务型 STS”的服务对象不应仅仅限于当前的决策群体,而是更应该将自己的关注点放之于广泛的社会运动中,如果仅仅将“服务对象”限于前者,那么这种“服务”是狭隘的,而且在目前也是难以获得成功的。当前的社会运动(如环境运动、伦理争论、安全与隐私运动等)非常需要专业化的理论支撑,这种“支撑”不仅仅是来自科学共同体的“官方解释”,还需要广泛的、专业性的批判观点,而 STS 研究者则具有这方面的优势;另一方面,建构主义 STS 长期与社会运动相分离,仅仅是关注于对知识生产过程的学术分析,如科岑斯认为,在一系列社会运动中,STS 没有发出自己的声音,在社会民主化道路上,STS 愈来愈远离^[11],因此,“服务型 STS”应该保持一种更为开放的、将广泛的社会运动纳入到“服务”内容之中的态度。

基于此,我们认为,STS 可以采取一种“曲线参与”线路,即并不仅仅限于直接为决策者服务这一路线,同时还为社会中更广泛的群体(广大社会公众、社会运动者)提供专业性的知识,使他们对当前的科学知识的发展有更全面、更深刻的认识。通过这种方式,既可以更有效地推动社会的民主过程,同时亦可以借助社会运动、公众或传媒的力量来达到影响决策者的最终目的。

3. STS 应采取何种策略与决策者对话

首先,应该确立的观念是:STS 的批判精神应该保持,与决策者对话并非意味着仅仅成为决策者的咨询者,批判性思想并非不能带来行动力,在很多情况下,对现有政策范式的反思与批判恰恰能够为未来决策的合理化提供智力储备——STS 应该保持自己的研究传统。

其次,STS 应该借鉴管理学、组织学、政策学中的一些概念、理论、分析方法,将其嫁接到自身的相关说明中去,实现自身观点“批判性与建设性的综合”,因为一味的批判往往给人们形成一种“愤青”的感觉。实际上在这一方面,其他领域的学者已经走在了 STS 前面,如蔡司(Ragna Zeiss, 2009)便说明了“组织与管理研究领域”中的研究者如何将 STS 领域中的“边界对象”概念扩展至自身领域中的一些做法,如将“边界对象”概念用以分析不同组织机构间的知识转换与共享过程^[12],“这一概念已经被 OMS 所转译以适应自己的研究需要,OMS 对它的运用已经开始独立于 STS”^[12]。

再次,STS 应该完善自己的“政策参与”专业分析框架,包括相关概念、理论、方法的详细研究,如参与路径的选择、参与角色的具体定位、研究范式的确立、工具箱的发展等。“进入政策之屋”不能仅仅停留在意愿层面,它还需要一个较为完整的研究框架及策略,提升自身的专业性。

最后,强化与科学共同体之间的对话,具备一定的科学修养。传统 STS 研究者常常采用诸如文化人类学等方法来分析科学知识,这种分析方法可以在不了解科学的情况下进行分析,这在很多情况下使 STS 研究者成为“科学外行”。然而,在具体的政策参与实践中,STS 常常由于不了解具体的科学知识而被决策者视为是非专业人士。如林奇(Michael Lynch, 2005)^[13]以 2001 年美国的一个 v. Hyatt 的法律案例作为实验场,将 STS 研究者科尔(Simon Cole)在这一场域中所发挥的作用作为检验事件,来分析 STS 研究者是否能够作为决策场中的决策者所认同,但这一检验的结果是不成功的,因为科尔并不具备专业性的科学素养,因此被视为是没有发言权的外行。

参考文献:

- [1] 曾国屏. 自然与社会之间:STS 学术“核场”探析[J]. 自然辩证法研究, 2009(3): 97-102.
- [2] Andrew Webster. Crossing boundaries: social science in the policy room [J]. Science, Technology & Human Values, 2007(7): 458-478.

- [3] Helga Nowotny. How many policy rooms are there: evidence-based and other kinds of science policies [J]. *Science Technology & Human Values*, 2007(32): 479-490.
- [4] Mervis J. NSF begins a push to measure societal impacts of research [J]. *Science* April, 2006(21): 311-312.
- [5] Brian Wynne. Dazzled by the mirage of influence——STS-SSK in multivalent registers of relevance [J]. *Science Technology Human Values*, 2007(32): 491-503.
- [6] London Winner. Upon opening the black box and finding it empty: social constructiv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J]. *Science Technology & Human Values*, 1993(3): 362-378.
- [7] Brian Martin. The critique of science becomes academic [J]. *Science Technology & Human Values*, 1993(18): 247-259.
- [8] Harry Collins, Robert Evans. The third wave of science studies: studies of expertise and experience [J].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2002(32): 235-296.
- [9] Wiebe E Bijker. The need for public intellectuals: a space for STS [J]. *Science Technology & Human Values*, 2003(28): 443-450.
- [10] 王华平, 许为民. STS: 从 SSK 到 SEE [J]. *自然辩证法研究*, 2007(3): 67-84.
- [11] Susan E. Cozzens. Whose movement——STS and social justice [J]. *Science Technology & Human Values*, 1993(18): 275-277.
- [12] Ragna Zeiss, Peter Groenewegen. Engagement engaging boundary objects in OMS and STS——exploring the subtleties of layered [J]. *Organization*, 2009(16): 81-100.
- [13] Michael Lynch, Simon Col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 on trial: dilemmas of expertise [J].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2005(35): 269-311.

Debate over the Theory of Service-oriented STS

Wang Yanyu

(The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Natural Scienc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 Beijing 100190, China)

Abstract: For a long time, there is a mutual separation and distrust situation between constructivism STS and research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 research domain. But Webster has put forward the idea of “service-oriented STS”, emphasizing that the STS researchers should have the consciousness of “decision-making service” and enter into “policy room”. He tries to break the fence betwee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 research and constructivism STS. “Service-oriented STS” theory has aroused widespread academic debate, around the issues of the what role that STS researchers should take in the policy room, the relation between academic STS and Service-oriented STS, Brian Martin, Nowotny and Webster have made a series of debates. How to consider about those debates? The article gives its answer from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 of whether is it necessary for STS to enter policy room, who are the service objects of STS, what strategies that STS should take when having dialogues with policy makers. At last, the article puts forward the idea that STS should go into social practice field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service-oriented STS; academic STS; policy room; engagement; decision-making service

(责任编辑 陈 静)